



MAO  
ZEDONG


毛泽东  
军事箴言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 编著

下

 辽宁人民出版社



# 毛泽东 军事箴言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 编著

下

Ⓛ 辽宁人民出版社



##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6日）

1946年夏天，抗战的硝烟散去不久，解放战争的烽火已经燃起。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第五次来到中国。8月6日，她乘卡车一路颠簸，前往延安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要完成她上次访华未能实现的愿望——见到毛泽东。在这里，她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这个“身材魁梧”“毫无拘束”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国革命领袖。

斯特朗问毛泽东：“你觉得中国的问题，在不久的将来，有政治解决、和平解决希望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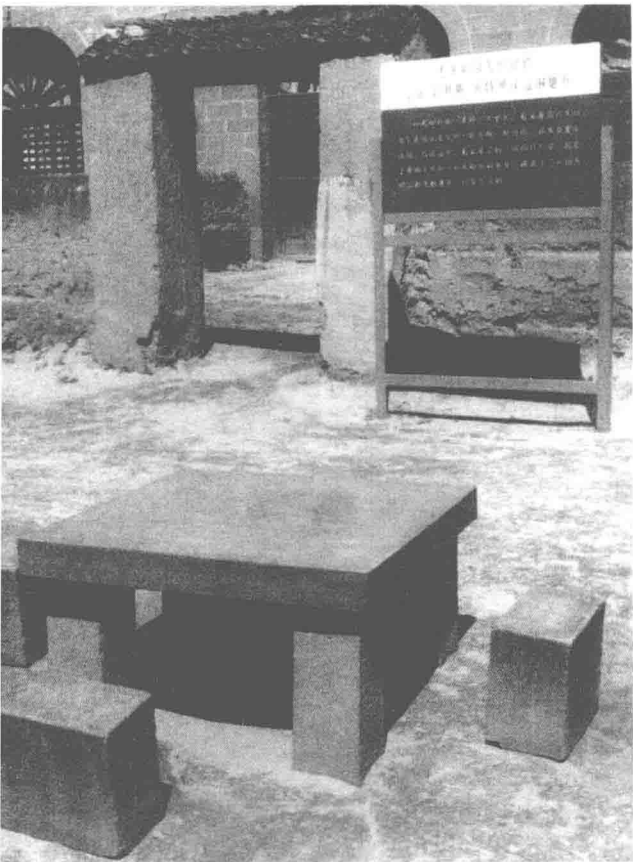
毛泽东回答：“这要看美国政府的态度。如果美国人民拖住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反动派的手的话，和平是有希望的。”

“如果美国人民问到共产党为什么作战，我该怎样回答呢？”

“因为蒋介石要屠杀中国人民，人民要生存就必



★ 1946年，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延安。



★ 图为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和斯特朗谈话的地点。

须自卫。这是美国人民所能够理解的。”

接着，这位61岁的美国记者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美国使用原子炸弹呢？如果美国从冰岛、冲绳岛以及中国的基地轰炸苏联呢？”

毛泽东目光如炬，用坚定的口吻回答道：

“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他接着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

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这一番发生在中国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对话很快震动了全世界。毛泽东告诉全世界人民：只有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反动势力看起来强大，但那是暂时的，是纸老虎，它们必将失败。这句话鼓舞了全世界革命者为着民族自由解放事业而不懈斗争。

毛泽东为什么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还得从毛泽东革命经历中的认识判断说起。

### ★34岁的毛泽东得出结论：真正的力量在人民手中

1927年春，北伐战争正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战线已经推进到上海和浙江宁波、富阳，安徽安庆一带。这时党内不少同志都对国共合作前景表示乐观，毛泽东却选择来到湖南农村考察农民运动。数十天的考察，毛泽东得出了一个结论：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在毛泽东看来，人类历史一直是在反动势力日趋没落、革命力量逐渐上升并最终取代反动势力的新旧交替中向前发展的，先进阶级取代落后阶级、民主势力战胜剥削压迫，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考察过农民运动后，毛泽东坚信：孙中山先生40年的努力没有做到的事情，就是他在遗嘱中痛陈的“唤起民众”，农民群众在几个月内就做到了。一切反人民的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人民的磅礴力量葬入坟墓。反动的势力必将灭亡，革命的人民必将胜利，因为真正的力量从来不在反动派手里，而永远在人民手中。这就是34岁的毛泽东得出的结论，它奠定了毛泽东革命生涯的基调。

毛泽东的考察报告发表之后不久，“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相继发生，大革命不可逆转地遭遇了失败，共产党被迫开始独立组织武装斗争。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为了贯彻“八七会议”所定的方针，毛泽东于9月9日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初湖南省委决定首先破坏粤汉和株萍铁路，随后组织各县和省城长沙起义，然而起义的三路部队均遭受挫折。据当时参加战斗的彭公达回忆，共产党人当时还没有能广泛发动群众支援配合，所以“人民没有起来”。

此时，毛泽东当即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南下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发。10月底，疲困交加的起义部队来到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开展工农武装割据，这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和人民结合在一起，共产党人第一次获得了真正的力量。1928年，毛泽东满怀信心地

指出，一国之内，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红色政权存在的外部原因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虽貌似强大，实际上内部早已四分五裂；而红色政权存在的更为根本的原因则在于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第一次和蕴藏着无穷革命能量的民众紧密结合在一起：革命的武装力量不仅包括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而且还有各县的赤卫队和乡的暴动队，军队不仅负责作战，而且积极做群众工作。

到农村去、到反动势力最薄弱的地方去，也就是到人民群众基础最好的地方去开展武装斗争。通过这样的斗争经历，毛泽东断言：“边界的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则更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正是人民的无穷力量给了毛泽东无比的自信。

### ★发动非正义战争的帝国主义者必将最终失败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内无民主制度，外无民族独立，人民要谋得自由和民主没有和平道路可走，而只有进行战争。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变迁，反人民的势力永远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自由民主的必由之路就是人民组织起来反抗到底。这一条真理不仅在国内革命中一再得到证明，而且也适用于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正义战争。

1935年春季开始，已经在东北三省横行数年的日本侵略者一面在华北对中国领土鲸吞蚕食，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一面诱骗国民政府签订了一系列旨在侵吞华北、灭亡中国的秘密协定。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蒋介石却电令西北军加紧对红军发起进攻。这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说：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都是非正义的，而只有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的反抗战争才是正义战争；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现之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的正义的反抗战争已经连成一体，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不再是孤立的，正义的反抗战争必将取得胜利。

1937年夏，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7月底，日军猛攻北平南苑，北平、天津在三日内先后沦陷，蒋介石为了防止日军自华北长驱直下徐州、威胁南京，遂在上海组织反击，把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改变为由东向西。尽管国民政府投入的兵力多于日本侵略者，但是由于各系军队缺乏协调、指挥不灵，加之武器装备远逊敌人，上海和浙江北部的抗战节节失利，大片国土沦陷敌手。与此同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则先后取得了平型关等战役的胜利，与华北、淞沪抗战国民党军的一再受挫形成了鲜明对比。

面对日寇的强大攻势和国内各界要求抗战的呼声，蒋介石不得不发表声明，要求“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但却始终缺乏发动人民实行全民族抗战的具体行动。

这年9月29日，毛泽东在谈到国共合作成立之后的迫切任务时痛切地指出：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是决然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华北和江浙地区的失败就是血淋淋的证明！尽管统一战线名义上成立了，但是国民政府迟迟不敢发动群众，广大的工人、农民、兵士、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许多爱国同胞还没有被唤起，还没有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这才是目前的最严重的问题！挽救危亡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全民族抗战，中国抗战是反压迫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所以政府不但不应惧怕人民，而且必须唤起人民积极地参加战争才能取得胜利。正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点明了这样一条原理：“战争的性质决定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发动非正义战争的帝国主义者必将遭到其国内外人民的反对并最终失败，而反压迫、反奴役的正义力量则会受到人民的拥护，是定将取得胜利的。

判断中国将会在抗击侵略的战争中取得胜利，毛泽东不是独此一家，当时有一种论调认为日军的机动力量将被大量牵制，无法再行进攻，短时间内中国军队就能够组织反攻并在短时间内战胜日本。与这种“速胜论”截然相反的则是认为中国必败的“亡国论”。

1937年秋天开始，短短几个月间，上海和南京相继沦陷。12月，日寇大肆虐杀中国军民，制造了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罹难者达30余万。1938年5月，日军攻陷徐州，更直接威胁华中重镇武汉、长沙。当时的国内，一方面恐惧、悲观、失望的情绪弥漫全国；另一方面盲目乐观的“速胜

论”也大有市场。毛泽东考察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后敏锐地指出，“亡国论”和“速胜论”都不可取，未来的形势是日本必败，中国则将会在艰苦持久的作战后取得胜利。他进而分析道，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暂时强大，但它发动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反人民的，不仅将受到被压迫的中国军民的奋起反抗，而且会引起其国内的阶级矛盾，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国家也会反对它；中国虽然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不如敌人，但中国是有着极大战略纵深的大国，更重要的是，抗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战争，支持战争的人民则有着无穷的力量。1938年5月，毛泽东为了反驳“亡国论”和“速胜论”撰写了著名的《论持久战》。他形象地说：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日本帝国主义的反人民、非正义和暂时强大，中国人民反抗侵略压迫的人民性、正义性和暂时弱小，两方面因素共同决定了抗日战争必然是一场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持久战。毛泽东这部著名的《论持久战》像伟大的灯塔一样照亮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光明前途！

对共产党人来说，“唤起民众”不是一句空话。毛泽东提出要组织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解放区所有的男女青年都要组织在抗日人民自卫军、民兵或者主力军队中，部队不仅可以随时担负作战任务，而且有能力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要把武装斗争与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的斗争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与政权的斗争，经济战线、思想战线的斗争和锄奸斗争等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

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最终必将失败，这不仅是毛泽东审视中国战场的形势得出的结论，更是对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判断。1942年10月的欧洲战场，顽强的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不仅顶住了纳粹的进攻，而且还毙俘德军数十万人，击毁上千辆坦克、2000多门火炮和1400余架飞机，扭转了不



利局面。这时战役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毛泽东已经断言，尚未结束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正是纳粹“灭亡的决定点”。这时，毛泽东撰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文章指明：斯大林格勒战役就是欧洲战场的转折点，从现在开始，纳粹的罪恶势力将“只有死路一条好走了”。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而有些革命的人们也往往在一个时期内被这种外强中干的现象所迷惑，看不出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实质。相应地，在亚洲、太平洋战场上，正在进行反人民战争的日本帝国主义也“将一天一天感到头痛，直至向它的墓门跨进”。

1945年4月末，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向大会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他说：“法西斯侵略势力是一定要被打倒的，人民民主势力是一定要胜利的。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句话振聋发聩，石破天惊！

### ★“从战略上说，完全轻视它；从战术上说，重视它”

1945年6月，欧洲战场上的反法西斯战争已经结束，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了题为“愚公移山”的讲话，他坚定地说：

“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作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没有人民挖不平的大山，一切看似猖獗的反动派在人民面前都注定失败。

可以说，毛泽东对战争结果的判断归结到底仍然是：谁站在人民一边，谁就将取得胜利。

艰苦卓绝的抗战是人民的胜利，但正当人民热切期盼即将到来的胜利之时，蒋介石集团却早已在策划夺取人民战争的胜利果实。日军投降之际，他一方面电令共产党指挥下的军队就地“驻防待命”，并设置了重庆谈判这场“鸿门宴”；另一方面宣判罪大恶极的侵华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无罪”，并秘密请他充当反共内战的“军事顾问”。蒋介石对内镇压、对外卖国的丑恶嘴脸再次暴露无遗。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时，国民党统治下的土地和人口均超过全国总量的百分之七十，国民党军总兵力约有430万人，正规军规模达86个整编师，其中22个为美械、半美械装备，此外还接收100万日军的装备，拥有军用飞机、坦克等大量武器。相比之下，人民解放军总兵力仅有127万人，用的是各路缴获的“万国牌”武器装备。据1946年7月的统计，解放区每月仅能够生产步枪1030支，迫击炮2门，机枪15挺，步枪子弹不及30万发。解放军的力量处于明显的劣势中。这些都使得蒋介石集团有恃无恐，幸灾乐祸地扬言3~6个月之内先消灭关内的人民军队，再着手解决东北问题。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蒋介石集团和美国等帝国主义势力的阴谋洞若观火。1947年12月，毛泽东说，蒋介石的方针就是镇压、逮捕和屠杀，他20年的统治是卖国独裁反人民的统治，他们的一切欺骗都已被他们自己的行为所揭穿，他们已经没有什么群众，已经完全孤立了。而与此同时，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在中国，共产党不但在解放区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信任，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党和人民不仅有身经百战的正规军，而且有广泛发动起来的游击队、民兵等人民武装。蒋介石和支持他打内战的美帝国主义等纵然不甘心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但人民战争的小米加步枪注定将消灭他们的飞机加坦克。

也正是在这些考虑下，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特朗说出了本篇开头那番话。

据说当时陪同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还有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和黎巴嫩裔的美国医生马海德。由于毛泽东第一次使用“纸老虎”这个词，陆定一不知如何翻译，就暂时翻译成“Straw-man（稻草人）”。

斯特朗问：“是指 Scare-crow（吓鸟的稻草人）吗？”

在华多年的马海德医生领会了二者的区别，纸老虎显然不是立在田里单纯依靠恐吓驱赶鸟儿的稻草人，他说：“不对，不是稻草人，是纸老虎，paper-tiger。”

从此，“纸老虎”这个词，无论中文还是英文，开始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也传遍了全世界。

毛泽东一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来自于一种政治家的自信，也源于对历史大势的准确把握。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人心向背决定战争胜败。追求自由独立是全民族共同的心愿，一切强加给中华民族的压迫、奴役和战争都将会遭到失败。

在经历了100多年沉沦、屈辱的历史后，中华民族终于在1949年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为了维护其侵略利益，继续不断向中国施加武力威胁，甚至以核战争相威胁。尽管新中国“一穷二白”，毛泽东还是多次一针见血地指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原因就在于它们是反人民的。

1956年7月14日，毛泽东在会见拉美客人时，进一步表达了对帝国主义强大势力威胁时的态度。他说：

“一切会有变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因为大多数人要求变。美帝国主义力量大要变小，因为美国人民也不高兴本国的政府。”

“我这一辈子就经历了这种变化。”

毛泽东再次运用了“纸老虎”说法：

“现在美帝国主义很强，不是真的强。它政治上很弱，因为它脱离广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它。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是纸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我看美国就是个纸老虎。”

怎么对待纸老虎？毛泽东分别从战略上和战术上提出了自己的考虑：

“我们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从战略上来说的。从整体上来说，要轻视它。从每一局部来说，要重视它。它有爪有牙。要解决它，就要一个一个地来。比如它有十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它还有九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八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

从战略上说，完全轻视它。从战术上说，重视它。跟它作斗争，一仗一仗的，一件一件的，要重视。现在美国强大，但从广大范围、从全体、从长远考虑，它不得人心，它的政策人家不喜欢，它压迫剥削人民。由于这一点，老虎一定要死。因此不可怕，可以轻视它。但是，美国现在还有力量，每年产一亿多吨钢，到处打人。因此还要跟它作斗争，要用力斗，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争夺。这就需要时间。”

什么纸老虎会被打破呢？毛泽东认为，当正义的力量、人民的力量一步步强大起来的时候，总有一天，纸老虎终究会经不起风雨。

“美洲国家、亚洲非洲国家只有一直同美国吵下去，吵到底，直到风吹雨打把纸老虎打破。”

他还说：

“总有一天，纸老虎会被消灭的。但是它不会自己消灭掉，需要风吹雨打。”

这些论断，突出地反映了毛泽东的“纸老虎理论”，再一次论证了最终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心向背：“力量小的，同人民联系的，强；力量大的，反人民的，弱。”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出访苏联期间，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言，还饶有興味地回忆起11年前接受斯特朗采访时的谈话，他说：

“1946年蒋介石开始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许多同志，全国人民，都很忧虑：战争是不是能够打赢？我本人也忧虑这件事。但是我们有一条信心。那时有一个美国记者到了延安，名字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我同她谈话的时候谈了许多问题，蒋介石、希特勒、日本、美国、原子弹等等。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纸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我也谈到沙皇是纸老虎，中国皇帝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你看，都倒了。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



★ 1957年，毛泽东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论述了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问题。

毛泽东清楚地告诉人们，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帝国主义和其他一切反动势力的侵略。

这一时期，毛泽东不断对国内和国际上的人们讲解“纸老虎理论”。

1958年12月，毛泽东在武昌出席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他在文章中明确作出回答：

“回答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既是真的，又是纸的，这是一个由真变纸的过程的问题。变即转化，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走向反面。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不独社会现象而已。我在几年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

毛泽东在向人们做解释工作的同时，深刻地阐述了事物的“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

1973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已经徐徐开启，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第五次访华。2月17日晚上，基辛格在拜访毛泽东的时候，问起毛泽东学英语的事：“主席现在正学英文吗？”

毛泽东否认道：“我认识几个英文字母，但不懂文法。”

基辛格微笑着说：“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单词。”对此毛泽东立即爽快地承认了：“是的，我发明了一个‘paper-tiger’。”

宾主相视大笑，在场的人忍俊不禁，无不为主泽东的博大胸怀和机智幽默的谈吐所折服。

毛泽东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著名论断和“纸老虎”这个极为形象的政治术语，随着毛泽东的智慧和幽默，传遍了国内国际，早已融入正义的人民力量之中。



## “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 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

——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8日）

毛泽东的这句名言，与他的那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好比孪生兄弟，如影随形。这句话恰恰是对毛泽东关于纸老虎问题的具体解释，或者说是纸老虎问题的对策措施。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并参加随后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上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做了乐观的判断，并号召国际社会爱好和平正义、反对侵略压迫的人民加强团结，打击帝国主义的侵略



★ 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

企图。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

“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

毛泽东这句话的思想内涵由来已久。这不仅是他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总结出来的一条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也是他领导全国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反抗一切敌人的真实写照。

### ★ “战略是‘以一当十’，战术是‘以十当一’”

在战争问题上，毛泽东学会既从战略上藐视敌人，又从战术上重视敌人，那是从大革命时期开始的。

1927年北伐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进行革命战争的新时期。这一时期，红军装备很差，物资补给相当困难，并且一开始就处在敌人的虎视眈眈之中，不断遭到敌人的“进剿”和“会剿”。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战术就成为革命战争能否坚持、红军能否发展壮大关键因素。

面对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毛泽东逐渐在井冈山摸索出一条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在红军的战略上，毛泽东提出：对力量比较强的敌人要采取守势，对力量相对较弱的敌人要采取攻势；在统治阶级政权破裂的时候可以比较地冒进，在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则要相对谨慎。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之时，毛泽东就从战略上明确指出，统治阶级内部早已经是四分五裂，看似强大的敌人实际上困难重重、必然失败，“边界的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同时，他还从具体战术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强调，幼小的红军要尽量避免分散兵力“冒进”，要充分借助群众基础较好、熟悉地形等优势弥补我军在装备和训练上的劣势，集中优势兵力打运动战、歼灭战而不是阵地战、击溃战。在战术上，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武装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把红军游击战争的原则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即著名的“十六字诀”。这



个战术原则说到底就是在充分重视敌人的实力的基础上避实击虚、趋利避害、灵活机动，尽量“使巧劲”，避免和敌人“硬碰硬”。

对敌我双方形势的清醒判断，对眼前形势和长远趋势的清醒认识，是毛泽东在战略上保持乐观、在战术上保持谨慎的出发点。正是由于坚持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到1930年初，红军在短短3年间从无到有，从若干小游击队发展到拥有10多个军、约7万人的部队，先后创建了井冈山、湘鄂西、赣南闽西等10多块革命根据地，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左”倾错误逐渐在党的领导集体中蔓延开来，给革命斗争造成了损失。1930年夏，国民党新军阀间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蒋介石“尽调湘鄂赣诸省驻军开赴津浦、陇海、平汉诸线”，与冯玉祥、阎锡山在中原战场上的总兵中超过100万人，在长达1000多公里的战线上鏖战不休，这个形势在客观上为红军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创造了有利条件。虽然革命形势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红军和根据地也有相当的规模，但是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还远远没有改变。这时党内以李立三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面前”，全国范围内的“直接革命的形势”更是“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决议案指责了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要求红军“坚决打击敌人的主力”，重点就是直接在主要城市进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进而实现全国革命。

在“取南昌、攻九江”“切断京汉路”“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错误计划之下，各路红军开始向敌人盘踞的中心城市和重要交通线展开进攻。结果数次攻打长沙均未成功，夺取九江和南昌的计划也不得不推迟，皖西苏区几乎全部失陷敌手，转战桂湘鄂三省的红七军和蕲春、黄梅附近的红十五军，浙南的红十四军等都屡遭重大伤亡。反倒是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一军团没有贸然进攻大城市，不但避免了损失还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直至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中央机关得到改组，李立三“左”倾错误才得到纠正。

血的教训一再提醒党和人民军队，敌强我弱的形势短时间内不会改变，尽管在长远上看、战略上看反动派进行的反人民、非正义的战争未来必将遭受失